

● 书 评

历史学家萧致治先生和近代史研究 ——兼评《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》

周 溯 源

[作者简介] 周溯源(1955-),男,湖北浠水人,北京《求是》杂志文化编辑部副主任,编审,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博士生,主要从事中国历史、史学理论研究。

[中图分类号] K 825.81 [文献标识码] E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3)04-0509-02

萧致治老师利用来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,赠送我一本《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》,已有一段时间了,最近挤时间细读了一遍,获益良多。这部新著是在他 70 华诞的前夕,由湖北教育出版社热诚推出的。该书收录了 40 多篇文章,共计 50 多万字,是从先生当时已发表的 100 多篇学术、理论文章中遴选出来的精粹之作。我捧在手上,沉甸甸的,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。先生的文章,有一部分我过去读过,至今记忆犹新;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看到过。做学生的一直希望先生能出一部文集,以便于史学界同志的研究参阅。如今希望变成了现实,我既为先生贺,更为读者高兴。

该文集分“综论”、“鸦片战争”、“鸦片战争后的中国”、“辛亥革命”、“其他”五部分,前面有一个代序,即先生所写的《七十述怀》。在这篇“述怀”里,先生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背景、成长道路和治学历程。他出生在湖南武冈县一个乡村,父亲是一位农村知识分子,一辈子教书。由于家大口阔,父亲收入又少,所以从小过着清贫的生活。初中毕业后,本想上高中,希望由高中而大学,由大学而留洋。父亲却以困难为由,逼他读不收费的师范。他用菜刀自杀来表示抗议。然而,这“自杀壮举”也未能改变命运的安排,最后还是上了师范。他上大学的梦想,只是到解放后参加了工作,在 1956 年 27 岁时才得以实现。他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系,毕业时因品学兼优被分配到著名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。在风景秀丽的珞珈山,他一住就是 40 年。40 个春夏秋冬,先生一直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,勤勤恳恳地在武大史苑耕耘、播种、收获。

结识先生,是我在武大历史系读第二学年的时候。当时开有辛亥革命史选修课,主讲人即萧致治教授。慕名来选修这门课的同学很多,还有不少外系的同学。每次先生讲课,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。他那清晰的思路,简洁的语言,丰富的征引,精当的论述,听起来是那样引人入胜。虽然他有较重的湖南口音,但并未影响同学们听课的兴致。每次讲完课以后,他总要留出一部分时间供同学们提问,通过问答的方式,使教学轻松活泼,有点有面。另外,他还布置一些思考题,帮助同学们提纲挈领,抓住主要内容,鼓励大家独立思考,不囿陈说,勇于创新。同学中有什么疑难问题,或者有什么拿不准的见解,都乐意上先生家中请教。先生总是热情接待,用平等的态度解答或探讨,直到来者满意。他待人总是那样谦谨热忱,和颜悦色。多年以来,我从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。

先生教书育人,不限于在校期间,许多同学毕业后还与他保持经常、持久的联系,继续从他那里得到教诲和帮助。就拿我来说,大学毕业后北上首都到党刊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。这里的工作要求之高,难度之大,是可想而知的。为了干好工作,我常向先生请教。80 年代打电话很不方便,只有写信,我给先生写过不少信,先生是每信必复,不厌其烦。进入 90 年代后,打电话方便了,我与先生的电话便成了“热线”。有时他到北方开会,只要有可能,就转到北京来看我。有时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会议,我就利用会议的间隙向他请教,请他帮我分析选题,推荐作者,介绍有关学术动态。

1995 年秋,先生偕夫人来京旅游。我有一部写近代人物传记的书稿刚脱手。为了减少、避免差错,我想请先生帮助审阅、把关,但又怕影响他们夫妇的旅游,不好启齿。先生看出了我的顾虑,主动挑明,慨然应允。一部 40 万字的书稿,先生牺牲旅游,连续一周夜以继日地审读,纠正了不少差错。有的地方经他改动,为之生色。有的问题因手头缺资料,暂

时存疑,回汉后他又给我来了一封长信,一一指出补正。审阅之细致,修改之严谨,考虑之周详,负责之彻底,使我感触良深。崇敬之情油然而生,并告诫自己,做学问一定要像老师那样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帮助人一定要像老师那样尽心尽力。

萧致治先生从年轻时起即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。他独立思考,不囿陈说,敢于创新的风格,从青年时起即显露锋芒。当他还是助教时,发现学者们对龚自珍的思想评价分歧甚大。有的学者认为,龚自珍的思想“包含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因素”;有的则认为龚氏思想“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……根本没有设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素的新东西”。究竟哪种意见正确?带着这个问题,他系统审读了龚氏的著作。经过一番由表及里、由此及彼的研究,他得出自己的结论:“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思想,主要是当时农民和地方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。从其本身来考察,确没有资本主义倾向,但也不是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,而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企图挽救统治危机的改革主张。”他的文章得到当时历史系副主任彭雨新教授、系主任兼武大校报主编吴于廑教授的好评,并被安排在《武汉大学学报》上发表。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。时间虽然过去了近 40 年,这一观点至今仍然站得住脚。

继龚自珍改革思想评价的文章发表后,先生在近代史领域更加勤奋耕耘,上下求索,因而成果迭出,到晚年已是著述等身了。1975 年,人民出版社决定组织编写大型学术专著《辛亥革命史》(三卷本),他应邀参加,并担任上册主编之一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专著,反映了当时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水平,出版后先后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多项奖励。他还对辛亥时期的领袖人物黄兴作了较多研究。鉴于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存在一种“重孙轻黄”或“扬孙抑黄”的倾向,他推动武汉大学历史系成立了黄兴研究室,并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。从 1987 年起,他主持编辑出版了《黄兴新论》、《领袖与群伦——黄兴与各方人物》两书,促成 1988 年底在长沙召开了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。1997 年,他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约撰写的《黄兴评传》,已于 2001 年出版。该书对黄兴的业绩作了公正的评价,对黄兴的思想作了科学阐述。评论者一致认为,该书求真务实,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此同类著作。

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,中国历史发展中划时代的重大事件。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,萧致治先生用力尤勤。1985 年,他主笔编写了《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》。该书熔编年与纪事为一炉,合史论和考据为一体,在体例上有所创新,填补了鸦片战争前 300 多年间的中西关系长期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,1986 年出版后被广泛征引。比如 2001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《落日的辉煌——17、18 世全球变局中的“康乾盛世”》。这是一本供领导干部学习阅读的读物,主旨是要人们记取康乾时期夜郎自大,看不到正在剧变的世界,未能与时俱进,以致 19 世纪起大大落后于西方,从而受尽了列强凌辱侵略的教训。书中《见证与文献》部分引用专家学者的著述约 16 万字,其中约 2 万字即引自先生的《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》一书(该书 2001 年 3 月印了 5 万册,很快销售一空,7 月又加印了 3 万册,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畅销书)。紧接着,先生又主持编译了《鸦片战争研究》、《林钦差与鸦片战争》、《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》(上、下)、《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》、《鸦片战争史》(上、下,66 万字)等多部专著。其中《鸦片战争史》是凝聚先生十多年心血的总结性成果。这部力作的特点是,不是把鸦片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,而是联系战争前后的中外时势,从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思想、中外关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,把它作为一次社会大变革、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衡量,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范围内来探讨。该书出版后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等多家报刊发表书评,认为是“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新突破”,“是目前鸦片战争史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”。1997 年连获中央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。

萧致治先生治史,很注重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。他牵头撰写的《中华民族魂》一书,被誉为“爱国主义的颂歌,催人奋进的征鼓”,1994 年获“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”。他还发表过多篇有关爱国主义的文章,收入该书的就有“爱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”、“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”等。

萧先生治史还有一个特点,不单做考证文章,而且十分注重理论建设,密切联系现实的改革开放,其论文都是论从史出,史论结合,具有思想深度和现实启迪。收入该书的有“近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启示”、“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近代史体系”、“论辛亥革命领导群体的集体作用”、“论黄兴的建国主张”、“论林则徐的勤政清廉”、“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输入及其影响”等等。前几年,他参与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史书《资政史鉴》的编撰。他主编的《革新》卷,长达 145 万字,介绍了历次改革的背景、经过,总结了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,探讨了革新的规律。这些论著文章,不仅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,而且充分体现了资政育人的史学功能。

萧致治先生虽已年逾 7 旬,但身板硬朗,精神矍铄,仍然活跃于国内外的讲坛上,笔耕不辍。前不久,他应邀到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作关于黄兴研究的讲座,我们师生又见了一面,长谈了一番。先生向我介绍了他对中国 21 世纪史学的展望,他的研究计划和有关课题进展情况。我由衷地高兴和敬佩。我联想起孔夫子的两句话:“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;“乐而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。我想这两句话用在先生身上不是很恰当的么!愿先生健康长寿,继续诲人不倦,提携后学;继续与时俱进,开拓创新,“老树春深更著花”!

(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)